

中南
经济
论丛

ZHONGNAN JINGJILUNCONG

宋丽
智 著

20世纪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的 转变与发展研究

——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

20 SHIJI 30 NIANDAI ZHONGGUO JINGJI SIXIANG DE
ZHUANBIAN YU FAZHAN YANJIU

Jiyu Shijie Jingji Daxiaotiao Chongji De Shijiao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南
经济论丛

ZHONGNAN JINGJI LUNCONG

宋丽智
著

20
世纪30年代

中国
经济思想的
转变与发展研究

——
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

20 SHIJI 30 NIANDAI ZHONGGUO JINGJI SIXIANG DE
ZHUANBIAN YU FAZHAN YANJIU

Jiyu Shijie Jingji Daxiaotiao Chongji De Shijiao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宋丽智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3

(中南经济论丛)

ISBN 978 - 7 - 5141 - 6671 - 2

I. ①2… II. ①宋… III. ①经济思想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F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6710 号

责任编辑：周秀霞

责任校对：刘 昕

责任印制：李 鹏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

——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

宋丽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 //jjkxcs. tmall. com](http://jjkxc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4. 5 印张 210000 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671 - 2 定价：4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12YJC790161）。

同时，本书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西方经济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840 ~ 1949”（2722013JC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大萧条产生的根源及其性质探讨	19
第一节 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迷茫	21
第二节 中国学者对于大萧条根源及其性质的理解	24
第二章 大萧条冲击下统制思潮的盛行	35
第一节 统制经济思潮的国际诱因	36
第二节 中国政界、学术界、工商界“三位一体” 对于统制经济思潮的倡导	38
第三节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回应	55
第四节 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经济思潮的跌宕起伏	60
第三章 从银本位走向法币改革的思想转变	62
第一节 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双重货币危机	62
第二节 应变性货币思想的发展——世界银价的 暴跌与暴涨	65
第三节 法币改革的思想转变	73
第四章 银行体系重建思想和金融统制思想	92
第一节 近代中国银行体系发展溯源	93
第二节 国人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诟病	97

第三节	中央银行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108
第四节	银行体系重建思想的确立与银行 国有化思想的盛行·····	115
第五章	从贸易保护主义到贸易统制思想·····	127
第一节	贸易自主的诉求与贸易保护思想的 初步认识：1912~1929 年·····	128
第二节	贸易保护思想的深入发展：1930~1935 年·····	137
第三节	贸易统制思想的兴起与盛行：1935~1937 年·····	156
第六章	农业危机、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思想的 交错与融合·····	164
第一节	农业危机、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交错并行·····	164
第二节	农业危机、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思想的融合·····	171
第七章	结语·····	201
参考文献	·····	206
后记	·····	224

绪 论

世界经济大萧条历来都是令经济研究者们着迷的课题，理论界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伯南克总结了目前关于经济大萧条的相关研究，他指出：“近来最重要的进展还是大萧条的研究重点的转变：从以前强调美国发生的事件，转向比较和分析同一时期多个国家的经历。”^① 研究重点的这种拓展至关重要，因为更关注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从根本上可以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大萧条核心问题的理解。而本书恰好针对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大萧条中的历练与演变进行研究，将为世界范围内解释大萧条问题提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借鉴。

同时，本研究也具有较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有些人认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与当代经济相去甚远，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大萧条时期都出现过，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破产倒闭、金融市场岌岌可危、货币危机甚至通货紧缩一触即发等。因此，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教益。简单说来，透彻地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比较“简单”的经济发生银行危机和大萧条的根源、各种经济变量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21 世纪比较“复杂”的经济中的危机，并对危机进行治理。

^① [美] 本·伯南克著，宋芳秀、寇文红译：《大萧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一、近代中国经济的世界历史性

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回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马克思试图阐释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规律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更进一步，他认为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而且，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③ 所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历史性而独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各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世界历史性的反映。

同样，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具有世界历史性。中国近代经济学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简单延续，更多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政治、经济冲突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一步一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要想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我们必须要将其同时置于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之中，充分考虑到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经济和经济思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只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

二、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宏观经济思潮转向的普适性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0 页。

本·伯南克指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这一点常常没有被充分认识到）。”^①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分子，中国同样接受了经济大萧条的洗礼，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信条和政策建议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发生了类似的转变，中国经济思想也必然随之发展和转变。

（一）西方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潮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潮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二是强调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时期。

第一个阶段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经济纲领，提倡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完美调节之下，供给就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就能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不必要的，政府仅仅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足矣了。

在此阶段，虽然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采取过一系列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但大多是为了应对战争或者保护国内利益不流失于国外，这种“干预”在时间上具有临时性，在广度上也不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经济的战时管制，但这是临时的。战争结束后，威尔逊总统立即取消了该管制。当代学者胡国成指出：“美国战后的经济运行几乎从一开始就自动地恢复了自由放任的方式”。^② 1920年哈定总统的口号为“恢复常态”，意味着就要恢复战前自由放任的状态。哈定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在企业中少点政府；在政府中多一点企业。”^③ 总的看来，哈定政府以及柯立芝、胡佛等战后历届共和党

① [美] 本·伯南克著，宋芳秀、寇文红译：《大萧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 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③ 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政府都在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第二个阶段为强调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时期，分水岭即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面对经济大萧条，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一筹莫展，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思路，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经济纲领，采取一系列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①政府的身份从“守夜人”转变为“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实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政策，组织公共建设，从而成功地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空前强大，新政的主要手段在于运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救济失业人员和生活无保障人员，进一步刺激美国工农商三业的发展，并改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在罗斯福新政的启发和影响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荷兰、英国、比利时、瑞典、挪威、意大利及德国等，普遍采用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措施，由国家指明经济发展方向。这一转变不仅支持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复苏，还为资本主义国家创建了新的经济秩序，实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成就了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此可见，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放任到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渐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受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行等严重挑战的情形下，人们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家的干预、完全回到自由放任主义。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重新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而占据优势。但是，这并不表明国家完全放弃干预经济，只是在国家干预的范围、形式和程度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到了90年代，布莱尔等欧美的“第三

^① 关于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请参见宋丽智、邹进文：《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6～138页。

条道路”的鼓吹者，更提出要把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可见，国家干预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机制之一了。

（二）中国的统制经济^①思潮

面对世界经济思潮的转向，中国经济如何表现？中国经济思想又将何去何从呢？历史的画卷重新定格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灾难深重的时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国家政权总是力图垄断工商业，特别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如盐、铁等。不但如此，帝王将相消费的各种工业品大多由官府直接经营或雇匠制造。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制度存在重大差异。而这种集权思想，历经清末、民国，一直持续存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门户，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被迫接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发生。虽然洋务运动被称为“自强运动”，但其主张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英、法等国家工业化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模式，工业化与私有制天然联系。而洋务运动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大部分企业由国家独资创办，由政府直接控制，与市场基本不发生联系。但是，由于资金短绌、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这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国有企业创办不久即遭遇严重危机。1872 年，李鸿章无奈之下提出“官督商办”政策。自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一大批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被改造成为民营公司制企业，开启了中国百余年国有企业改革史的先河。直

① 相对于自由经济而言，“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统制经济”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补充或纠正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而“计划经济”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根本改造；第二，“统制经济”只是强调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部分（主要是生产方面）计划，而“计划经济”则是对所有的经济活动统加干预。

至民国初年,政府除了在军事工业、金融业、铁路、公路、建筑及电讯业等领域继续投资外,很少再在轻重工业领域办企业。^①由此看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经历了由“自强”军用企业到“求富”民用工业,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最后到“商办”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占据上风的局面呢?这与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思想是完全相悖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政府缺乏实行有效经济政策的能力,而并不是其主观上不想控制经济。政府不但没有能力直接控制经济发展的局面,而且连“守夜人”的基本职能也无力发挥,诸如法律和秩序这种政府为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形同虚设。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有一定能力实施一些相关的改革措施。而这个时间段恰好遭遇世界经济大萧条,统制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得以强化。国人开始认识到国际上流行的统制经济应该是加强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的救国方策。由此,舆论界普遍支持实施统制经济,并提出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见解与国民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因为为了巩固政权,国民政府早已注重并倾向于国家统筹经济发展,只是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借此时机,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掌管财政经济的各部门首长立即对统制经济思潮予以热烈的响应,蒋介石对德国的“统制经济”赞赏有加,宋子文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十分钦佩。于是,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日益高涨,由学者的提倡、工商企业家的实践演变为政府的政策,又因为政府对统制经济政策的采纳更加激发了学术界进一步倡导统制经济的劲头和工商企业家在国家统制下进行经营的热情。

总的看来,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各有其利弊。自由经济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统制经济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则是在市场失灵状态下的有益补充。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

^① 参见邹进文:《清末公有企业改革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76 页。

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虽已从西方移植过来，但是却缺乏自由发展的历史条件，所以自由主义思潮难免成为空中楼阁。近代中国始终要面对外资挤压与官僚垄断的双重压力，还要面对不断的暴力与战争，被动接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洗礼，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在这种严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自由主义思潮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很难赢得国人的同情，与时代的紧迫感与危机感格格不入。^① 美国学者格里德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②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统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有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各级官员利用统制经济之名，大肆扩张国家资本，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统制经济思潮日益遭人诟病。

归根结底，统制经济思潮的盛行是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人类社会一直争论不休的基本而又永恒的话题。迄今为止，这一探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究其原因，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存在着种种缺陷，难以解决人类社会日益复杂而又变化莫测的经济问题。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再次兴起。这一思潮的逆转显然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复兴的思想背景。因为此时，西方各国的经济已经基本走出经济大萧条。于是，在国际间英美自由经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互相激荡的大背景下，中国试图在三者之间进行折衷选择。但是争论随时存在，中国的经济思潮亦随着世界思潮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大萧条作为一个有力的冲击事件，不仅对世界经济思潮产生深刻影响，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潮的变革。

^① 参见宋丽智：《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载《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7 期，第 91 页。

^② [美] 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8 页。

三、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的特异性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理论界对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绝大多数研究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研究重点集中在西方国家,主要探讨经济大萧条为何爆发、如何传播、怎样治理与预防等。而身处亚洲的大国——中国,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 1929 年,而是 1931 ~ 1932 年的冬春之交。^①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是仅有的物价没有惨跌反而上涨的国家。杨格指出:“在中国,以银为标准的物价上升了四分之一以上,于 1931 年后半年达到最高峰。另一方面,在各金本位国家,物价下跌约三分之一。”^②因此,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重要国家都小。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在这段时期,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暂的繁荣。1931 年 9 月开始,英镑、日元和美元等货币先后脱离金本位并且贬值,银价在 1932 年以后也从下降的趋势逆转为上升。1934 年美国收购白银政策造成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局面日益严重,中国最终无法逃脱深陷萧条的命运。

综观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经济现实,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在大萧条中的表现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好。^③当然,这一思路的根基在于仅考察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将战争、灾荒等其他影响因素剔除在外。日本学者城山智子也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值得特别关注。”^④

①②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13 页。

③ 参见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1 页;管汉晖:《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载《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6 页。

④ [日]城山智子著,孟凡礼、尚国敏译:《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 ~ 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导论第 3 页。

（一）保守性与被动性共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基础生产结构和基本生产单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究其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体制，它使得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速度仍然较为缓慢。甲午以后，由于进出口商品继续扩大的冲击，同时国内近代工业兴起，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才开始加速。中国自然经济分解的程度，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相对比重关系中可以得到反映。据粗略匡算，到1920年，在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约为55:45，自然经济仍占优势；到1936年二者的比重逆转为42:58。^①如果说把商品经济比重开始超过自然经济视为自然经济由深度分解走向解体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处于解体之中了，然而这一解体的过程仍然是十分滞缓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自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然经济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本是经济发展的严重掣肘，但在面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却因祸得福。自然经济的特点在于自给自足，交换与分工的程度比较低，对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大萧条在中国的蔓延。认识这一特殊性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并不是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经济大萧条初期即遭受全面的经济打击。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除了具有保守性外，同时兼具被动性的特点。中国的保守性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关，而被动性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形态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此逐步在列强的侵略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实行对外开放，以边缘化和

① 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2页。由于资料获得困难，徐新吾仅能做一个粗略的匡算，并有待以后修订。他的文献资料来自唐传泗（192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五章第一节（未刊稿）、丁世洵（1936）《南开大学学报》第20~27页、巫宝三（1933）《中国国民所得》、卜凯（1936）《中国农家经济》第230页等相关资料。

不平等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一种近乎静态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且以地缘为基础的封建小农经济逐步走向全球经济。经济关系也因此由静态转为动态,由封闭转为开放,基本上与原来的经济模式根本背离。可以说,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相对“闭关锁国”时期来说,20 世纪 30 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①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局却是长期动荡不安的,经济发展不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选择依附于英美强国,进而得到英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由此可见,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缺乏自主权,中国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态度只能是被动接受。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国人对于银价暴跌暴涨的应变性反应。1934 年,正当国内专家学者都在悉心研讨银价暴跌对中国的危害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国人却猛然醒悟,中国经济此时面临的问题已经是银价暴涨和白银大量外流。这种情况较之银价暴跌更加危险,将会导致物价下跌,以及大批工厂停业倒闭,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岌岌可危。可见,在世界银价剧烈波动的这一时期,中国几乎都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直至被拖入经济崩溃的漩涡,成为西方国家复兴经济计划的牺牲品。

(二) 特殊的货币体系——银本位

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的第二个特殊性质则与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有关。这一特殊性质也可以解释中国如何成为西方国家复兴经济计划的牺牲品,而并不是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经济大萧条初期即遭受全面的经济打击。

从 19 世纪晚期到 1931 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金本位制度构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经济大萧条发生的货币冲击正是通过金本位制度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传导,由通货紧缩引致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引致全面的经济萧条。而中国

① 管汉晖:《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载《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7 页。

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使用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国家。简单说来，对于金本位制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而对于中国，白银却既是商品又是通货。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树一帜，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经济大萧条相隔离，拥有了实现短期经济繁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不通。相反，由于中国政府缺乏对于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的监管，中国的外汇交易，即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贸易并不受控制。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世界白银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汇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银价的冲击。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那么，中国能否控制国际银价的变化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作为一种商品，白银的市场价格受世界范围内供给、需求因素的影响。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因此无法控制白银的供给。私营银行从事白银和外汇交易，白银进出口数量的变化则主要取决于潜在的利润，因此白银的需求亦无法控制。可以断定，因为中国没有能力控制白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的供求，所以无法控制白银的价格和进口量。换句话说，此时中国的货币供给类似于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对于本国货币需求和收入等因素变动起反应的内生变量。这使得中国极易受到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从而潜在的威胁必将转化为现实的威胁，国际银价波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市场和物价。

经济大萧条爆发的标志性现象之一是资本主义各国物价低靡。在实行金本位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白银作为一种商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1929~1933年，世界大多数地方正遭受严重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银本位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相反，据统计，1929~1931年，中国上海、天津和广州三个代表性城市的批发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中国的平均物价上升了25%左右，显示出这几年出现了轻微的通货膨胀。^① 探究我国银价下跌、物价上

^① 管汉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第17页。